

### 3. 如实记述农业领域中的性别差距<sup>9</sup>

土地、现代投入品、技术、教育及金融服务等生产资源的获取，是决定农业生产率的一项关键因素。农业对于妇女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女性农民（插文 4）获得农业生产者所需的生产资源和服务的机会要少一些。与男性相比，女性可能较少拥有土地或家畜、采用新技术、使用信贷或其他金融服务，或接受教育或推广服务。有些情况下，妇女甚至无法掌控自身时间的利用。

尽管性别鸿沟的大小因资源和地点而异，导致性别资产差距的根本原因却在各区域重复出现：社会规范系统性地制约着妇女做出选择。然而无论原因或程度如何，性别资产差距导致妇女的农业生产率降低了，从而加大了经济和社会成本。

#### 土地

对于靠农业谋生的家庭来说，土地是最重要的家庭资产。获取土地是务农的一项基本要求，在许多地区对土地支配的意义相当于财富、地位和权力。增强妇女获得土地的机会和对土地的支配，是提高妇女在家庭和社区中地位和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改善妇女获得土地的机会和地权保障，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率有直接影响，对改善家庭福祉也具有长远影响。例如在尼泊尔，加强妇女的土地所有权关

系到儿童健康状况的改善（Allendorf, 2007 年）。

记述土地获取上存在两性不平等的论据不计其数。所有发展中区域的妇女均不太可能拥有或耕种土地，无一例外；她们不太可能获得出租的土地，而她们有机会获得的土地通常质量差且地块小。

关于妇女获取土地的最全面的数据来自粮农组织性别与土地权数据库（粮农组织，2010 f）。数据库从不同来源收集数据，包括家庭调查、农业普查及学术文献等。该数据库提供关于男女在“农业经营者”中所占比重的信息。农业经营者的定义是，对农业资产行使管理支配权的人或一群人。资产可拥有、出租或从共同财产资源中予以分配，并可在收成分成的基础上加以经营。

土地资产方面的两性差别在所有区域都显而易见，令人震惊（图 8）。在有数据的北非和西亚国家中，妇女占有所有农业经营者的 5% 不到。非洲撒哈拉以南 15% 的平均数掩盖了从马里的不足 5% 到博茨瓦纳、佛得角和马拉维等国 30% 以上之间的巨大差异。拉丁美洲拥有最高的女性农业经营者的区域平均比重，在智利、厄瓜多尔和巴拿马都超过 25%。

男人除了更可能持有土地之外，支配的土地资产一般也都多于妇女。来自农村创收活动家庭调查数据库的 20 个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可比数据显示，所有这

<sup>9</sup> 本章材料基于粮农组织（2010e）。

#### 插文 4 女性农民、户主与数据限制

关于女性农民的数据不多。参与农业生产的大多数妇女以家庭为生产单元，她们的活动通常与整个家庭的活动无法分开。关于女性农民的现有数据中，大部分来自家庭调查，并且附着于女户主家庭的活动之中，而女户主家庭在大多数国家的女性农民中为数不多。关于男户主家庭中女性经营的土地存在一些数据，主要是非洲的，那里的男人和女人常常分开田地单独经营。本章使用的观察单元（个人、家庭、农民或农田）随所讨论的资源 and 掌握的数据情况而变化。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女户主家庭的普遍程度一般高于其他区域（附表 A5），不过这掩盖了该区域内存在的巨大差异。事实上，发展中区域的女户主家庭普遍程度最高的国家（斯威士兰）和最低的国家（布基纳法索）均出现在非洲撒哈拉以南。

应区分两类女户主家庭：(i) 事实上的，即家庭中有一成年男性伴侣在外务工但仍以汇款和其他经济社会关系进行参与的；(ii) 法律上的，即家庭中没有男性伴侣，如寡居、离婚或未婚的妇女家庭。区分这两类家庭的全面性数据往往无法获得，但从我们确有数据的少数情况来看，大多数女户主家庭都是法律上的。在马拉维、巴拿马和乌干达，分别有 70%、63% 和 83% 的女户主家庭是法律上的（Chipande, 1987 年；Appleton, 1996 年；及 Fuwa, 2000 年）。在柬埔寨和老挝人民共和国，大多数也是法律上的（粮农组织/日内瓦社会观察站/缔约方会议，2010 年；及粮农组织/农渔部，2010 年）。得以按类别划分女户主家庭的研究大都发现，法律上的女户主家庭可能更易遭受系列经济社会冲击之苦（Seebens, 2010 年）。

些国家中，男户主家庭经营的平均农业土地资产均大于女户主家庭（图 9）。在孟加拉国、厄瓜多尔和巴基斯坦，土地获取机会的不平等现象尤为严重，那里男户主家庭持有的平均土地资产是女户主家庭的两倍多。农村创收活动的结果证实了在拉丁美洲（Deere 和 León, 2003 年）和非洲（粮农组织，1997 年）的研究发现，显示男性支配的土地资产通常都大于女性支配的土地资产。

#### 家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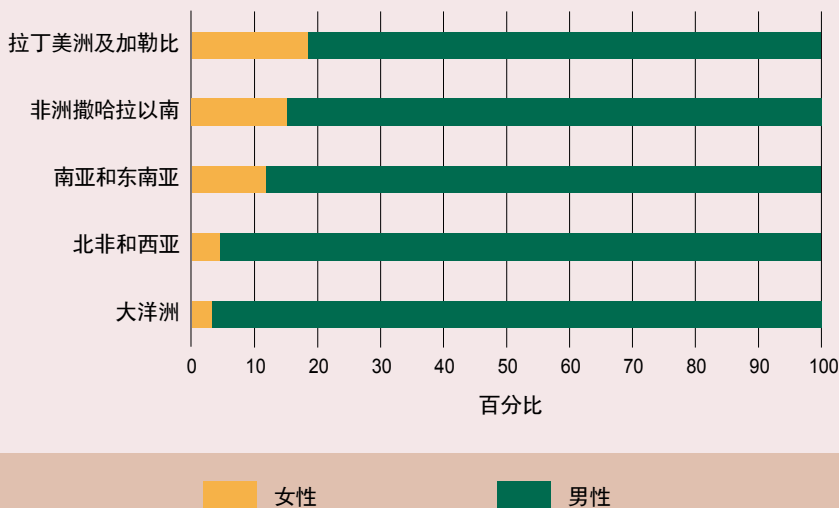
家畜是农村地区另一类关键资产（粮农组织，2009 a）。在许多国家，家

畜是最有价值的农业资产之一，是收入和财富积累的源泉，也是抗御冲击的重要手段。在许多区域，役畜也是耕地、土地清理和运输等活动的主要动力来源。

正如土地获取的情况一样，关于家畜资产的证据表明存在系统性的两性不平等。男户主家庭的平均家畜资产多于女户主家庭（图 10）。家畜资产方面的不平等在孟加拉国、加纳和尼日利亚表现尤为严重。在这三个国家中，男性的资产是女户主家庭的三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来自家畜的净收入在男户主家庭远远高于女户主家庭。农村创收活动数据库有这两个国家的家畜收入但没有家畜资产信息。

图 8

主要发展中区域的农业经营者中男性和女性所占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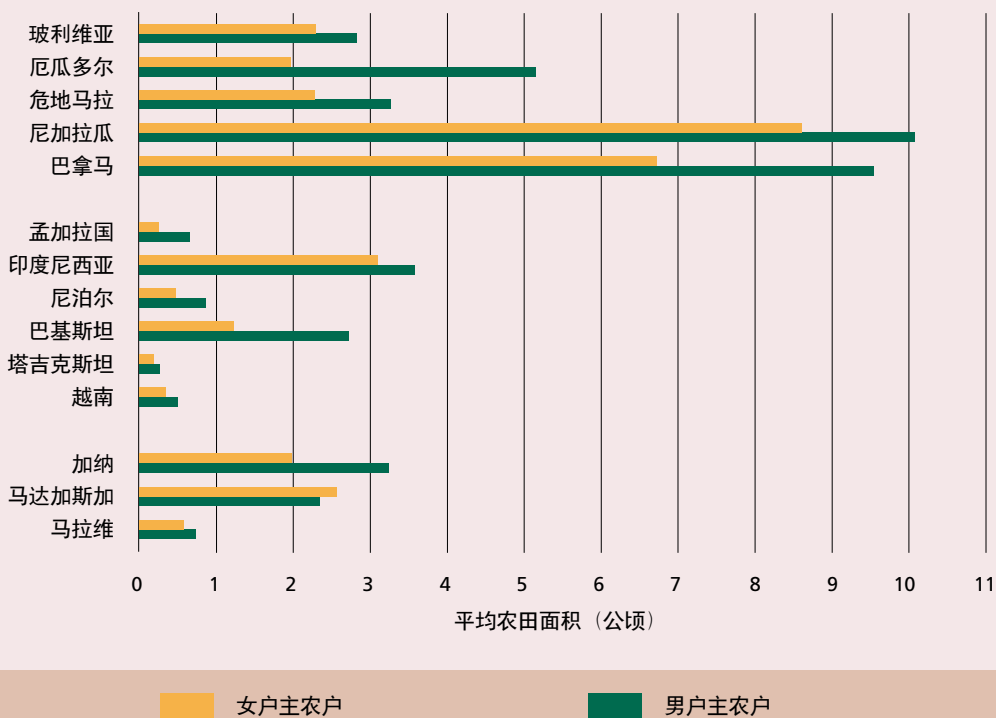


注：区域总数因缺少数据并未覆盖所有国家。国家层面的数据见附件表 A5。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0f。

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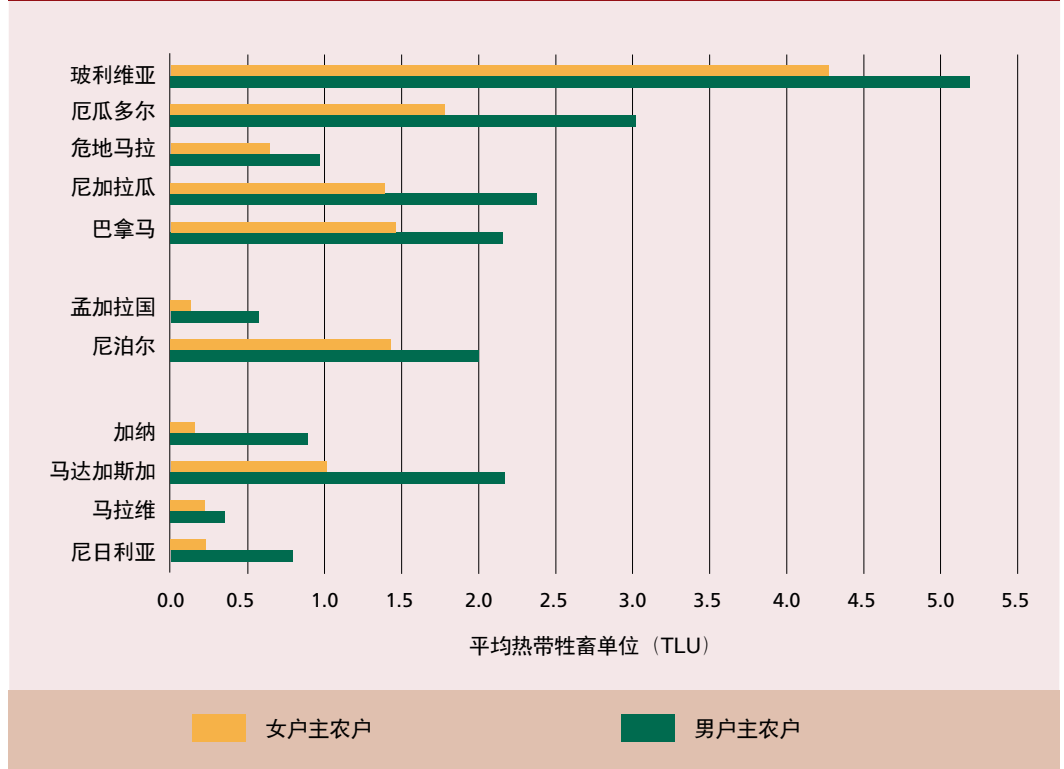
农户资产：农田面积



注：除玻利维亚、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尼加拉瓜和塔吉克斯坦之外，所有国家的男户主农户和女户主农户之间的差异，在95%的置信度范围内，具有统计显著性。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0d 和 Anriquez，2010年。

图 10  
男户主农户和女户主农户的牲畜资产



注：使用了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农户调查结果。计算牲畜数量时使用了热带牲畜单位，一个热带牲畜单位相当于一头250公斤重的牲畜，但计量尺度具有区域差异。比如，南美的计量尺度是：1头牛=0.7个热带牲畜单位，1头猪=0.2个热带牲畜单位，1头羊=0.1个热带牲畜单位，1只鸡=0.01个热带牲畜单位。除危地马拉外，所有国家的男户主农户和女户主农户之间的差异，在95%的置信度范围内具有统计显著性。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农村创收活动（RIGA）小组和 Anriquez，2010年。

农村创收活动数据库根据户主性别提供按家庭分列的信息，因此数据反映不出家庭内部对家畜支配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因文化和环境而异，但总体来说，男人负责饲养出售大家畜，如牛、马和骆驼等，而女人则负责支配小家畜，如山羊、绵羊、猪和家禽（粮农组织，2009a年）。例如在尼加拉瓜，妇女拥有约10%的役畜和牛，但拥有55%至65%的猪和家禽（Deere, Alvarado和Twyman，2009年）。即使在妇女联合拥有大家畜的情况下，也不一定有机会获得这些大家畜提供的服务，印度妇女以及用牛情况的调查显示如此（Chen，2000年）。

农村创收活动的数据库以实物（热带家畜单位）来衡量家畜，不过其结果与其他评价家畜资产价值的研究是一致的。例如，来自北尼日利亚的数据表明，男人家畜资产的价值大约是妇女的两倍（Dillon和Quiñones，2010年）。同一研究发现，在把家畜当作财产储备和防御冲击的缓冲物上来说，男人和妇女对家畜的利用不尽相同。男人更可能持有母牛和公牛此类大家畜作为资产，而妇女则更可能持有小家畜、家庭耐用品和珠宝这样的资产。与男性相比，妇女在应对危机和变老时动用资产更快（Dillon和Quiñones，2010年）。

## 劳动力

劳动力供应取决于家庭能够动用的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可从当地劳动力市场上雇佣的劳动力数量。出于若干原因，与男人和男户主家庭相比，妇女和女户主家庭遇到的劳动力制约均更为突出。作为农业劳动力和雇佣劳动力，妇女一般均面临着性别制约。低水平人力资本（教育、健康和营养）是农业和其他行业中制约妇女劳动生产率的一个因素（Behrman, Alderman 和 Hoddinott, 2004 年）（插文 5）。有些营养问题特别影响妇女，如普遍存在并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缺铁症（Quisumbing 和 Pandolfelli, 2010 年）。就特定农活而言，劳动的性别分工往

往昭然，结果造成男女活计之间不易替换。此外，由于照顾家人、拾柴汲水等家务劳动，妇女在时间上也受到限制（McGuire 和 Popkin, 1970 年；Quisumbing 和 Pandolfelli, 2010 年）。

与男户主家庭相比，女户主家庭面对的劳动力制约更为严酷，因为她们的家庭成员一般较少而受抚养子女较多。在一些地区，男性离家在外，令性别劳动分工本已产生的制约雪上加霜（Peters, 1986 年）。女户主家庭可从男性亲戚那里得到帮助，但只能等他们忙完了自家地里的活计之后。女户主家庭一般耕种的地块较小，但这或许无法抵消家庭劳动力供应短缺的状况。例如，马拉维的玉米种植小农中，女性拥有的土地少，但每公顷使用的劳动力仍比男性农民少 10% 左右，而且大部分劳动力由儿

### 插文 5

#### 劳动生产率与饥饿、营养和健康

饥饿、营养和健康是决定一个人工作能力、生产率及认知发展的重大因素。关于营养的问题，只有 37 个发展中国家收集有关于男女慢性能量缺乏症的数据（附表 A6）（世界卫生组织，2010 年）。在 17 个国家中，患有慢性能量缺乏症的男女比例相差一个百分点或者不到一个百分点；其余的 20 个国家中，有 13 个国家的妇女患有慢性能量缺乏症的比例较高。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观察数据来看，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妇女不太可能像男人那样罹患慢性能量缺乏症，而在南美洲和亚洲，特别是在东南亚，妇女则更可能患上慢性能量缺乏症。关于成年人的报告数据与关于体重不足儿童（五岁以下）的现有数据相一致。例如在

亚洲和太平洋，女孩体重不足的比例大于男孩，而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则相反。

一些地方的妇女因饥饿和营养而陷入不利处境，但并非各地都如此。不过，某些健康和营养问题与性别有关，如经期、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对能量和营养的需要增加，其营养状况影响子孙后代。还有证据显示，妇女的发病率高于男人（不仅仅因为妇女活得时间长），而且还不太可能获得医疗服务（Buvinic 等人，2006 年）。因此对社会而言，营养和健康方面的性别差异可能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解决特定妇女健康和营养问题的政策干预是重要的，但干预的性质和范围应始终反映具体环境和地方状况。

童提供，孩子们必须劳动，以弥补母亲因其他职责而造成的劳动力不足 (Takane, 200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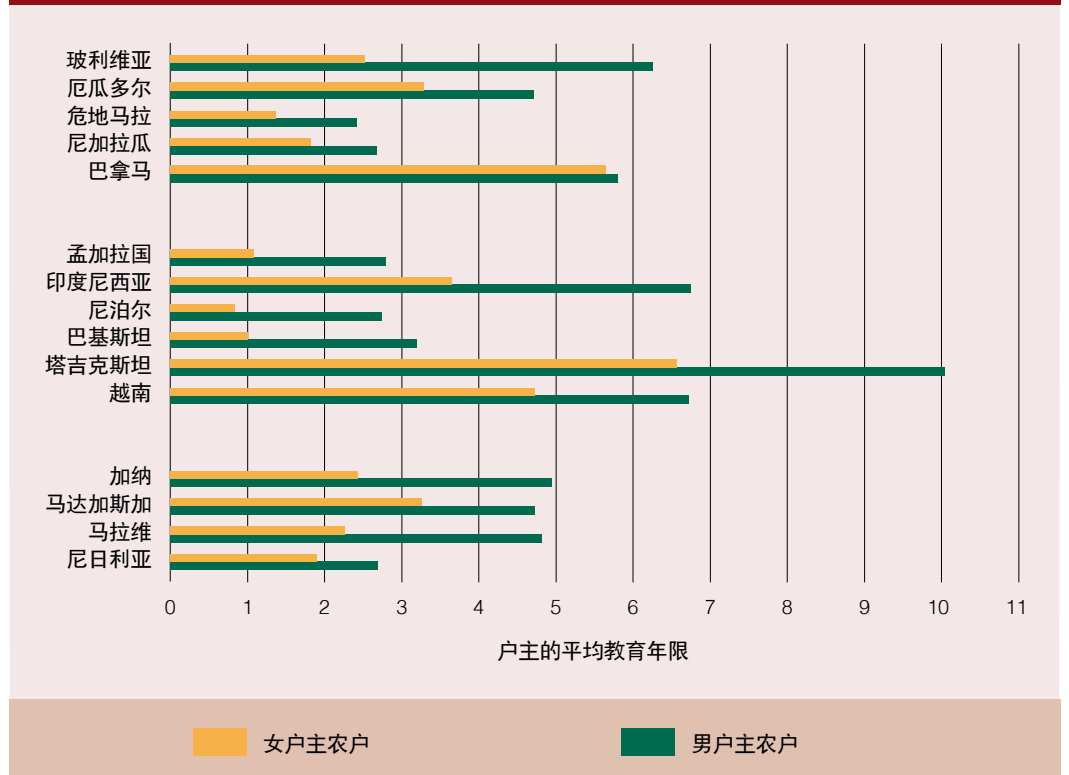
家庭和社区责任以及劳动力性别分工需要，意味着女性农民无法像男性农民那样劳作多产，使得她们更难以应对农产品价格上涨。一些文化规范要求，耕地喷药等一些农活要靠男性劳动力完成；没有他们的话，女性农民就会延误农时，导致收成损失。例如，马拉维种植玉米的女性农民需要男劳动力来耕地，但是女户主家庭往往没有能够承担这项农活的男性家庭成员，而且可能也没有雇佣男劳动力所需的现金。结果，妇女耕种的地块小一些，获得的收成也低一些 (Gilbert、Sakala 和 Benson, 2002 年)。这种错综复杂的限制意味着马拉维的妇女难于种植烟草等经济作物，或种

植需要购买投入物的改良玉米，因为她们没有获取信贷所需的收入，也不能保证偿还。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劳动力的制约甚至可能阻止女户主家庭去申请信贷 (Chipande, 1987 年)。在埃塞俄比亚，女户主家庭的收成较低，因文化准则要求耕地由男人承担，但她获取男性劳动力的机会有限 (Holden, Shiferaw 和 Pender, 2001 年)。

## 教育

人力资本是决定社会个体能否获得机会的重要因素，并与家庭的生产能力及其经济社会福祉密切相关。一个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 (通常以户主的教育水平或家庭中处于劳动年龄的成年人的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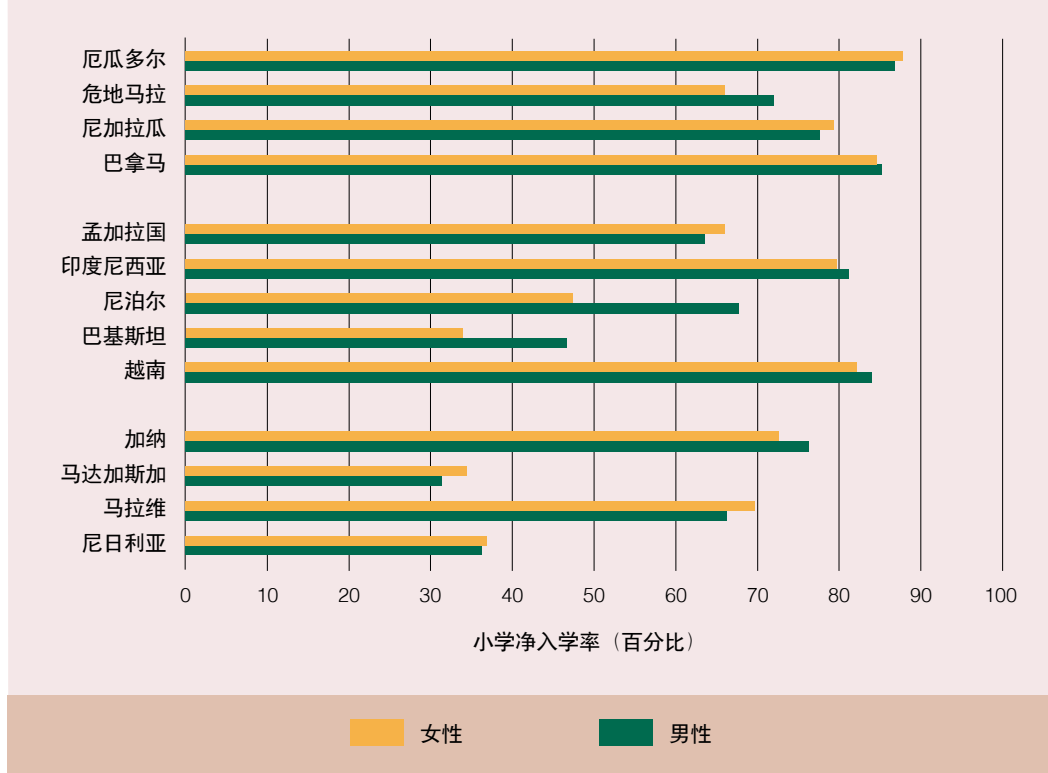
图 11  
农户男女户主的教育状况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0d和 Anríquez, 2010年。

图 12

## 农村初级教育入学率的性别差异



注：入学率是指上小学的小学适龄儿童人数占法定小学适龄儿童总数的百分比。只有加纳、危地马拉、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存在异于零的统计显著差异性，置信度为95%。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农村创收活动（RIGA）小组。

均教育水平来衡量)与农业生产率、家庭收入及营养状况等衡量指标紧密相关,而这些指标最终影响着家庭福祉和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2007a)。

两性在教育方面的差异显著而普遍(图11)。除巴拿马以外,样本中所有国家的女户主的教育水平均低于男户主,而在巴拿马,这种差异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相关数据表明,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哪个区域,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就人力资本积累而言,农村地区的女户主都处于不利境地。

这项事实反映出对女孩的教育偏见史。尽管存在着这种偏见,但近几十年来,人力资本积累是性别差距显著缩小的一种资产类别。尽管各个区域的进展水平不均,且重大鸿沟依旧存在,但

女孩小学入学率有了很大提高,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差距缩小了。106个国家致力于实现教育机会两性均等的千年发展目标3,其中有83个国家在2005年前实现了这个目标(世界银行,2007b)。农村创收活动数据库中的大部分国家都已实现小学入学率的两性均等(界定为男女入学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图12)。拉丁美洲妇女取得的最大进步之一出现在中小学教育领域,然而巨大的性别差距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土著民族中依然根深蒂固。在南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教育方面的性别鸿沟(注册和完学水平差距)依然最大。

妇女在农业部门占据重大比重的区域,除普通教育完学水平之外,农业科技的女性高等教育也具有高度相关性。



### 插文 6 非洲农业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中的妇女<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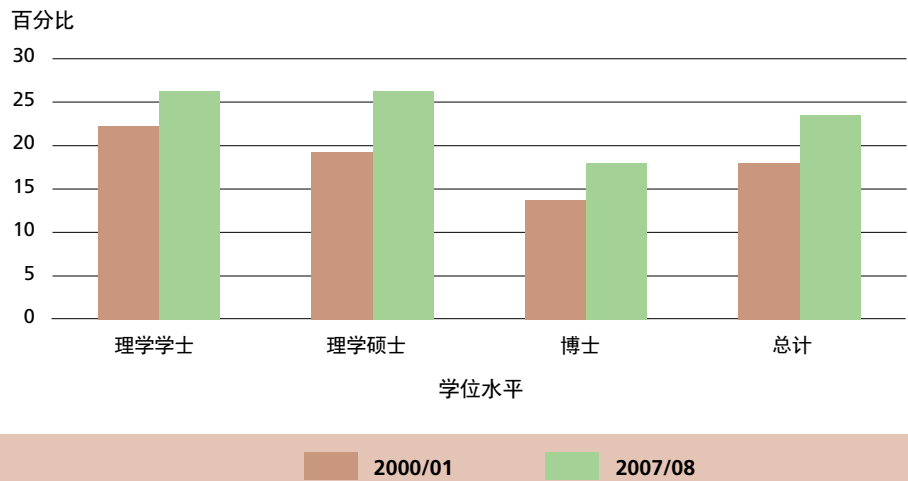
2008年，农业科技指标 (ASTI) 和非洲女性农业研究与开发 (AWARD) 这两个项目开展了一项调查，以期获得按性别分列的能力指标，此次调查涵盖 15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 125 所农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sup>2</sup>。这项研究发现，从 2000/01 年度至 2007/08 年度，女性专业工作人员总数增加了 50%，这 15 个国家中有 4 个国家 (博茨瓦纳、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赞比亚) 的女性工作人员增加了一倍。相对而言，女性在专业工作人员总数中所占比重同期从 18% 增加到了 24%。这一增加涉及所有三个学位级别 (学士、硕士和博士)，但在这 15 个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图 A 和 B)。在南非 (41%)、莫桑比克 (35%) 和博茨瓦纳 (32%)，农业研究和高等教育领域的女性比重都特别高；相反在埃塞俄比亚 (6%)、多哥 (9%)、尼

日尔 (10%) 和布基纳法索 (12%)，农业专业工作人员中只有少数为妇女。与该区域其他国家相比，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和乌干达的女性专业人员受教育程度较高，其中四分之一以上持有博士学位。

女性参与农业研究的未来走势将受到当前学生注册人数和毕业水平的影响。高等教育妇女注册人数日益增多，不仅非洲撒哈拉以南如此，在其他区域也是这样 (统计研究所，2006 年；教科文组织，2004 年)。这在农业科学领域似乎也是如此，可惜的是没有按性别分列的趋势数据。不过在农业科学领域中，大多数女生注册的都是理学学士学位课程。男生的情况也是如此，反映出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许多农业院校只设有为数不多的博士学位和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图 A

2000/01 年至 2007/08 年，14 个非洲国家农业和高等教育机构的专业人员中女性比重平均数的变化 (按学位水平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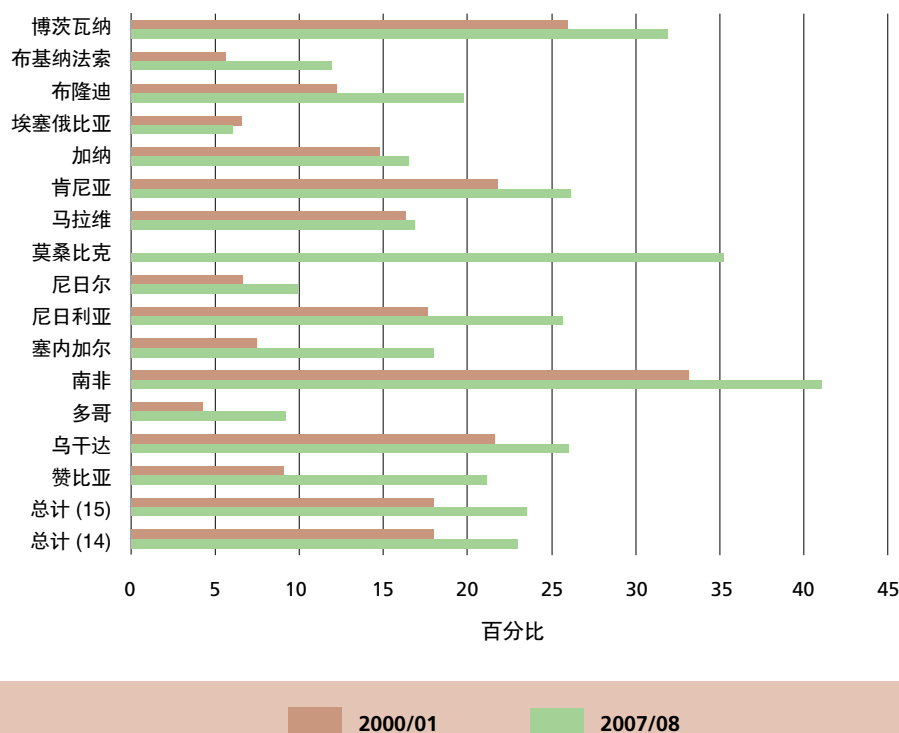
注：因缺少 2000/01 年数据而不包括莫桑比克。

资料来源：Beintema 和 Di Marcantonio，2009 年，依据农业科技指标 (ASTI) 数据集。



图 B

2000/01年至2007/08年，专业人员中女性比重的变化（按人头数计）



注：因缺少2000/01年数据而不包括莫桑比克。

资料来源：Beintema 和 Di Marcantonio, 2009年，依据农业科技指标（ASTI）数据集。

在农业领域中受聘的专业女性比重及在农业科学领域注册的女生比重不断加大，表明非洲农业领域中的性别鸿沟可能正逐步缩减，特别是在南部非洲。然而，进入非洲农业研究和高等教育领域的妇女和男性人数中，增加的大多数为学历较低及职业生涯刚刚开始年轻工作人员。这15国的样本中，平均一半以上的女性专业工作人员是41岁以下，而男性专业工作人员总数中平均有42%在41岁以下。平均而言，女性工作人员总数中有31%和男性工作人员总数中有27%持有理学学士学位。这15个国家的平均数也掩

盖了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见 Beintema 和 Di Marcantonio, 2009年）。

在职业阶梯的上部，女性比重下降幅度过大，只有14%的管理岗位为妇女所有，大大低于在农业领域受聘的女性专业工作人员的总比重。因此，与男性同事相比，在高级研究、管理和决策位置上的女性代表性低。

<sup>1</sup> 本节由 Nienke Beintema 撰写，基于农业科技指标数据库 ([www.asti.cgiar.org](http://www.asti.cgiar.org))，Beintema (2006年)，及 Beintema 和 Di Marcantonio (2009年)。该数据库由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管理；非洲妇女农业研究与开发项目由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性别与多样性计划管理。

<sup>2</sup> 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多哥、乌干达和赞比亚。

近几十年来，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事科技研究的妇女人数大为增加，但是在大多数国家中仍然水平不高。在农业研究领域，现在急需更高的女性代表性，特别是非洲撒哈拉以南，那里的农业劳动大军中有大量的妇女。女科学家、女研究管理人员、女讲师和女教授能够提供不同的见解和看法，能够帮助研究机构更有效地应对非洲农民面临的特有而迫切的挑战，她们也可成为农业领域学生和其他妇女的榜样。非洲农业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中的女性专业人员比重有了很大增长（插图 6）。

## 信息与推广

及时提供新技术新技能的实用信息，是农民决定是否采用某项创新的关键。虽然在巴西、中国和印度等一些国家，社会化推广服务的作用日渐强大，但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农民获得新技术信息的主要来源依然是公共推广服务体系。推广服务包含了一系列由专家提供的农业、农业企业和卫生等众多服务，旨在提高生产率，改善农村整体民生。农业推广服务可带来单产显著提高。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向男性和女性提供的推广服务均维持在较低水平，同时，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对推广服务的利用程度更低（Meinzen-Dick 等人，2010 年）。粮农组织 1988—1989 年一项涉及 97 个国家的推广组织并按性别分列数据的调查（现有最全面的调查）显示，面向女性的推广资源只有 5%。此外，只有 15% 的推广人员是女性（粮农组织，1993 年）。

在离开核心家庭之外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环境下，缺少女性推广人员严

重阻碍着妇女参加推广活动。人们对女性推广人员的看法因国家和婚姻状况不同而异。例如在加纳，在男户主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农民拥有与推广人员接触的同等机会，但在女户主家庭中，女性农民与推广人员的接触则少得多，虽然她们愿意与任何性别的推广人员交流（Doss 和 Morris，2001 年）。但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很多女性农民更愿意与女性推广人员接触；到 1997 年，女性推广人员占推广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而 15 年前还几乎没有（Due-Magayane 和 Temu，1997 年）。

然而即使在女性可以获得推广服务的情况下，她们却不一定明显受益。在肯尼亚，与推广人员接触能够显著提高男性经营土地的产出，但对女性经营的土地而言却结果不定（Saito、Mekonnen 和 Spurling，1994 年）。相对女性农民而言，推广服务人员倾向于与男性农民联系，因为人们普遍误认为女性不从事农业活动，而农业推广的相关建议最终会由男性户主“渗透”到每一位家庭成员。通常，推广服务是面向那些更容易应用现代创新技术的农民，例如较发达地区的有充足资源的农民。如上文所述，女性相对不易获得资源，从而可能被推广服务提供者所忽视（Meinzen-Dick 等人，2010 年）。

最后，服务推广形式可能会限制女性接受创新技术信息。与男性相比，女性相对受教育程度低，可能限制她们积极参与使用很多书面材料的培训活动。时间上的制约以及文化约束可能阻碍了妇女参与推广活动，例如本村以外的实地考察，或男女共同参加的实地考察等（Meinzen-Dick 等人，2010 年）。

过去十年间，人们发明并试行了一些新型的参与式推广方式，希望把“自上而下”的服务模式转变为农民主导程度更高的服务模式，这些方式可以更具有妇女针对性，并增加她们对创新的应用 (Davis 等人，2009 年)，本文的第五章将对此进行讨论。参与式的服务方式可以促进农民与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形成良性的反馈意见循环，研究者可以根据实地需求调整创新。

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s)，例如收音机、手机、计算机、互联网等，也能够信息传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提供了快速获取和分享信息、联络交流、资源调配及教育机会。自 2005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手机入网用户翻了一番。目前，发展中国家居民中 57% 是手机用户 (2005 年是 23%) (国际电信联盟，2010 年)。

这些技术可能有利于那些无力跋涉赶往市场的农村妇女。在获取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农村女性也许会受到自身教育程度、资金和时间的限制。方便适宜的应用场所可以帮助女性利用这些技术 (Best 和 Maier，200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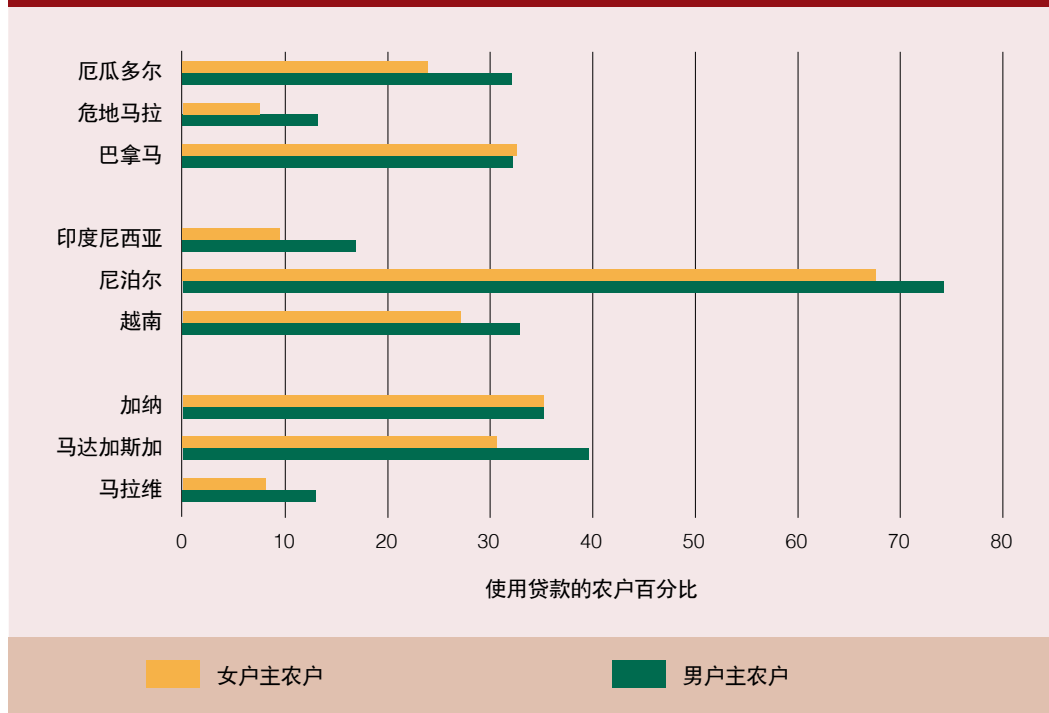
## 金融服务

存款、信贷和保险等金融服务为在国家、社区和家庭层面增加农业产量、提高粮食安全程度以及增强经济活力提供了机会。很多研究显示，增加女性对金融资源的直接获取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投入，表现为对儿童健康、营养和教育的投入。

那些无力支付短期支出的生产者，或希望购买高效而昂贵的技术的生产者，

图 13

农村地区女户主农户和男户主农户的贷款使用状况



注：使用了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农户调查结果。性别差距计算为使用贷款的男户主农户百分比和使用贷款的女户主农户百分比之间的差异值。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农村创收活动 (RIGA) 小组和 Anriquez, 2010 年。

必须依靠信贷市场或者其他信贷资源。如果不能获取信贷，生产者可能无力承担为提高生产率、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而必须进行创新与投资带来的风险和先期费用。

有证据表明信贷市场并不是性别中立的。法律障碍和文化规范有时会阻止女性拥有银行账户，或独自签订金融合同。女性通常对可用作贷款抵押的固定资产的掌控较弱。私人 and 公共借贷机构对女性的制度歧视通常导致女性被排除在信贷市场之外，或是给予妇女的贷款额度要低于因同类事由给予男性的贷款额度 (Fletschner, 2009 年；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和农发基金，2009 年)。

农村创收活动资料集显示，9 个国家的 7 个国家中，女户主家庭的信贷水平要低于男户主家庭 (图 13)。例如在马达加斯加，所有女户主家庭中的信贷使用家庭比重比所有男户主家庭中的信贷使用家庭比重低 9 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加纳和巴拿马在使用信贷方面没有明显的性别鸿沟。

另有其他证据也证实了在获取信贷方面的性别鸿沟。例如在尼日利亚，14% 的男性获得了正式信贷，而只有 5% 的女性获得了正式信贷。在肯尼亚，获得正式贷款的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分别是 14% 和 4% (Saito、Mekonnen 和 Spurling, 1994 年)。在乌干达，农村女企业家获得的信贷只占农村可用信贷的 1% (Dolan, 2004 年)。同样在乌干达，几乎所有的的女户主家庭都表达了扩大农业生产活动的意愿，但却缺乏资金购买土地、种子、肥料、农药等投入品或者雇佣工人。她们指出缺乏信贷是阻碍生计多样化的突出障碍之一 (Ellis、Manuel 和 Blackden, 2006 年)。

在孟加拉，金融机构 1980 年的农村贷款中有 5% 贷给了女性，到 1990 年才比 5% 稍高一点，虽然本研究期间在孟加拉出现了专门针对女性的特殊信贷项目 (Goetz 和 Gupta, 1996 年)。来自孟加拉的证据进一步表明，即使信贷项目提高了妇女获得信贷的可能性，她们也不一定能够保有这些资产的支配权：White (1991 年) 发现女性取得的贷款中，有 50% 用于男性的生产活动；Goetz 和 Gupta (1996 年) 指出，所有案例中，平均只有 37% 的案例属于女性对贷款资金拥有全部或显著控制权的情况；Chowdhury (2009 年) 报告说，格莱珉银行对女性的信贷与男性经营的微小企业绩效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但与女性经营的企业绩效没有正相关性。

在东亚，信贷偏见方面的证据呈现出不一致性。在中国，de Brauw 等人 (2008 年) 发现，女性经营自家农田的家庭和男户主家庭在获得土地和信贷方面享有同等机会。另一方面，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粮农组织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 年) 在越南共同实施的研究显示，女户主家庭比夫妇共同做主的家庭借贷更少，获得正式信贷的机会更少，且支付的贷款利息更高。

就拉丁美洲而言，Fletschner (2009 年) 的报告称，在巴拉圭，农村女性通常只从信贷合作社获得贷款，而非国家银行和信贷批发商那里。她还发现在同等社会经济条件下，女性比男性利用信贷的机率要小，并且有时无法依靠她们的丈夫来化解信贷方面受到的制约。女性在取得资本时所受的制约对她们的生产能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可量化的，例如，除与丈夫所受信贷限制相关联的效率损失外，当女性无法满足其信贷需求时，他们家庭的经济效率会再下降 11%。(Fletschner, 2008 年)。

## 技术

获得新技术对保持提高农业生产率起关键作用。性别鸿沟广泛存在于各个农业技术领域，包括机械和工具、动植物优良品种、肥料、病虫害防治措施以及管理技能等。各种制约因素，包括上文所述的性别鸿沟在内，导致在新技术获取与应用以及购买使用投入品和利用现有技术方面的性别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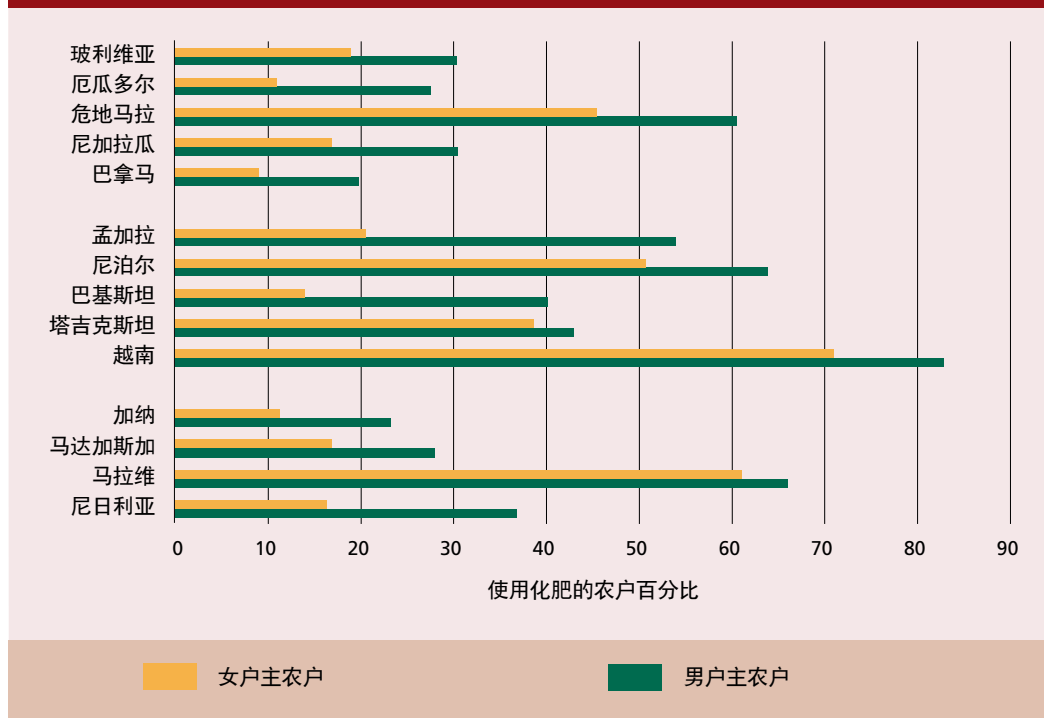
购买使用投入品由是否能够获得补充性资产决定，如土地、信贷、教育和劳动力等；在所有这些方面，女户主家庭受到的制约都大于男户主家庭。先进技术的使用与教育呈正相关性，但同时也取决于时间的限制 (Blackden 等人, 2006 年)。对于农业这样一项周转期长

的经营活动而言，经营者需要营运资本用于购买肥料、良种等投入品，然而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女性相对男性更难取得信贷。此外，女性吸收风险的能力低于男性，这也是制约女性使用先进技术和投入品的一个因素。

有证据表明，各区域在使用先进技术和购买使用投入品方面均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 (全面的文献综述参看 Peterman、Quisumbing 和 Behrman, 2010 年)。例如，在此研究涉及的所有国家，男户主家庭使用肥料的情况比女户主家庭普遍得多 (图 14)。虽然差异趋势表现明显，不分区域和技术，但是不平等的程度却呈现显著不同，南亚 (孟加拉和巴基斯坦) 以及西非 (加纳和尼日利亚) 的不平等程度似乎更加昭然。

图 14

女户主农户和男户主农户的化肥使用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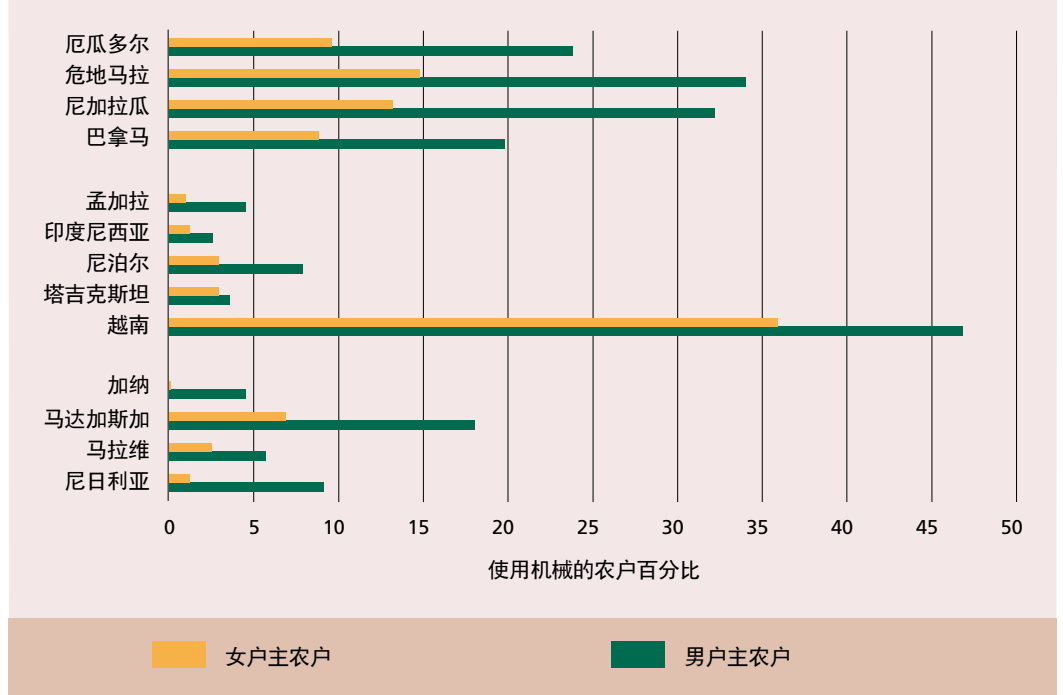


注：使用了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农户调查结果。所有国家的男户主农户和女户主农户之间的差异，在95%的置信度范围内具有显著性。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农村创收活动 (RIGA) 小组和Anriquez, 2010年。

图 15

## 女户主农户和男户主农户的机械使用状况



注：使用了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农户调查结果。所有国家的男户主农户和女户主农户之间的差异，在95%的置信度范围内具有显著性。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农村创收活动 (RIGA) 小组和 Anriquez, 2010 年。

详细的国别研究令人们对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例如在加纳，Doss 和 Morris (2001 年) 发现只有 39% 的女性农民使用了优良作物品种 (男性农民为 59%)，因为她们可以获得的土地、家庭劳动力和推广服务要少于男性。肯尼亚的一些研究显示，女户主家庭的良种和肥料利用率远低于男户主家庭。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与男性相比，女性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力少，受教育程度低，并且在获取信贷时受到更多的限制 (Kumar, 1994 年; Saito、Mekonnen 和 Spurling, 1994 年; Ouma、De Groote 和 Owur, 2006 年)。信贷限制同时也制约了贝宁和马拉维的女户主家庭对肥料的获取 (Minot、Kherallah 和 Berry, 2000 年)。在布基纳法索，妇女的每公顷肥料施用量要少于男性 (Udry 等人, 1995 年)。

按性别对机械化生产 (工具和其他耕作设备) 进行分类的研究很少，也许是因为对所有农民来说，拥有拖拉机和耕地机等现代耕作设备的情况并不普遍，特别是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在所有国家中，使用机械设备的农民比重都较低，但女户主家庭的农民比重更低，甚至有时低很多 (图 15)。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的一些研究指出了在工具的获取和所有方面存在的性别差异。在冈比亚的一个灌溉水稻项目中，没有一个妇女拥有犁地机，而且拥有除草机、播种机或多功能耕作工具的妇女人数都不足 1%；而男性拥有这些工具的比例分别为 8%、12%、27% 和 18% (Von Braun、Hotchkiss 和 Immink, 1989 年)。涉及肯尼亚三个区的一项农户调查数据显示，妇女拥有的农具价值



## 插文 7

## 乌干达咖啡的小农生产和销售

咖啡是乌干达的第一大出口商品，为全国约 500 万人提供就业（直接和间接）（乌干达银行，2001 年；Kempaka，2001 年）。小农户通常将咖啡生产与香蕉、大蕉、豆子、红薯和玉米等主要作物进行间作，一般采用简单的咖啡种植方式，肥料、农药等购置农用品的使用微乎其微，灌溉也十分罕见。

Hill 和 Vigneri (2009 年) 的一项研究中使用的样本覆盖了 1999 到 2003 年间接受调查的 300 个咖啡种植户，其中 23% 是女户主家庭（主要是寡居但也有未婚、分居或离异的妇女）。相比男户主家庭，女户主家庭拥有的劳动力、土地和咖啡树较少，富裕程度和教育程度也低。女户主家庭的户主一般年龄较大，在很多情况下是妻子在丈夫去世后接替一家之主的角色。由于男、女户主家庭在生产规模、流动性和人力资本等方面存在这些基本差异，预计二者在作物选择、生产方法和进入市场方面会存在较大差别。

尽管男、女户主家庭用于咖啡生产的劳动比重和采摘的咖啡树数

量大体相当，且每株树的单产也基本相同，但由于女户主家庭的生产规模小得多，女性出售的产品少于男性（男性平均为 151 公斤，而女性仅为 47 公斤）。

大多数小农户的咖啡以干咖啡果的形式就地出售，当地称作“基博科”，由商人在购买后进行研磨。一些农民将咖啡运到市场去卖，以获得高价。男户主家庭的成员比女户主家庭更倾向于将咖啡运到市场上销售。男户主家庭的交易中有 15% 是在附近的咖啡市场完成的，而女户主家庭的这一比例只有 7%，可能是因为骑自行车的男性比女性多，更容易来到市场。如果农民先在市场上将咖啡研磨之后出售，那么售价更高。只有 3% 的交易是以咖啡粉的形式完成的，全部出自男户主家庭。

这一研究得出结论认为，销售方面的性别差异原因是女性咖啡的销售量较小，且没有自行车。研究还发现了一个女性面临的重要制约因素，即利用增值销售渠道较为困难。而男户主家庭通过利用增值销售渠道，每卖出一公斤咖啡多收入 7%。

仅占男性农民农具设备价值的 18% (Saito, Mekonnen 和 Spurling, 1994 年)。

在一项关于贝宁中部一个灌溉项目的生产率性别差异的近期调查中，研究者发现，动力耕耘机等犁地运输设备按小组使用，但妇女小组只能等操作员完成了所有男人田里的农活后才能开始使用这些设备犁地。由于犁地播种时间延误，女性面临减产，因而可能无法进行下一季作物的

种植 (Kinkingninhoun-Médagbé 等人，2010 年)。农业机械使用上的性别差异可能会产生其他影响。例如，Quisumbing (1995 年) 提出结论认为，拥有更多土地和工具的农民更可能采用其他技术，因此突出显示了不同农业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

此外，缺乏运输技术限制了妇女流动，削弱了她们将作物运到市场上去的能力（插文 7）。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类型的女户主家庭在利用技术时都受到同样制约。在肯尼亚的小农场中，未婚、离异或寡居女户主家庭使用畜力的程度最低。相比之下，那些丈夫生活在外的女户主家庭使用畜力和雇用工人的情况更多，因为她们仍可以受益于她们丈夫的名义和社会关系，并经常收到丈夫的汇款 (Wanjiku 等人, 2007 年)。

### 主要信息

- 在各个区域和各种背景下，从事农业的女性都面临性别制约，限制她们获取生产投入品、资产和服务。在土地、牲畜、田间劳力、教育、推广服务、金融服务和技术领域都可以看到性别鸿沟。
- 在拥有数据的发展中国家，所有土地所有者中有 10% 到 20% 是女性，但这一数字不能反映甚至同一区域内各国之间的显著差异。土地所有者女性比重最高和最低的国家均在非洲。
- 在拥有数据的国家中，几乎所有国家的女户主家庭经营的农田面积都较小。在某些国家差距可忽略不计，但在其他国家，女户主家庭经营的农田面积仅为男户主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
- 在拥有数据的所有国家中，女性农民拥有的牲畜数量远远少于男性农民的牲畜数量，且女性较少拥有大牲畜，如可用作役畜的牛等。
- 女户主家庭经营的农场可用的劳动力较少，因为这些家庭通常较小，成年劳动力较少。同时，妇女需要承担繁重无偿的家务，这限制了她们参与更有效益的生产活动。
- 教育的性别差距在国家层面有所改善，一些国家的女性完学率甚至超过了男性，但在大多数区域，妇女和女孩受教育状况依然落后。教育的性别鸿沟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女户主的教育年限通常不足男户主受教育年限的一半。
- 小农户在获取信贷和其他金融服务方面都受到制约，世界各地均是如此，但在大多数国家，能够获取信贷的女性农民比重比男性农民低 5 到 10 个百分点。获取信贷和保险对其他资产的积累和保有来说很重要。
- 女性使用肥料、良种等需购买的投入品以及农机具的可能性比男性低得多。在很多国家，女性使用肥料的几率仅为男性的一半。